

史学研讨录




李勇
主讲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SHIXUE YANTAOLU

史学研讨录

李勇 主讲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研讨录 / 李勇主讲. —合肥:黄山书社,2015.6

ISBN 978 - 7 - 5461 - 5055 - 0

I. ①史… II. ①李… III. ①史学 - 文集 IV. ①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4416 号

出版人 任耕耘
责任编辑 马德权
装帧设计 熙宇文化
责任印制 李 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230071)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0.25
书 号 ISBN 978 - 7 - 5461 - 5055 - 0
定 价 39.00元

服务热线 0551 - 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 - 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序 言

2015年初春,闲里找忙,翻阅往年教学记录,不经意发现从事硕士研究生教育已逾10年。多年与研究生研讨的记录,竟已积累到厚厚一叠。

如今,生活节奏变快、事务密度加大,先贤所谓每日“三省乎己”,竟成奢望。然而,一项工作做了10年,若还不作一反省,则实在无甚托词。

于是,在厚厚的研讨记录中遴选12个专题,这些专题均为自己有过思考、学生亦感兴趣,且在本人主持的研究生课程中得到较充分讨论者。

编纂这样一本小册子,名曰《史学研讨录》,权作躬身自省,以见平日教学情状之一斑。

因研讨形式自由,不敢说什么体系,且错误难免,一些观点未必成熟。祈盼读者诸君批评、宽宥。

李勇

2015年3月23日

Context

Preface /001

I . History : Various Meanings , and Being Covered /001

II . Casting off the Yoke of the Natural Science i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012

III . Distinguishing the Academic Source , Zhang Shi Zhai ' s Idea in Jiao Chou

Tong Yi /025

IV . Scepticism , the Spirits of Historiographies /037

V .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of the Sources /049

VI . The Defects in Historical Knowledge , Anti - Logic and Anti - Society /065

VII . Historicism , It ' s Uses and Defects as a Method in Historical Studies /078

VIII . An Idea of Social Ranks : the Class Analysis in Historical Writing /089

IX . God and Man , Nature Science and Humanity : the Stage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ies /102

X . The Secret Historical Writing ,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19

XI . The Native and the Foreign : the Stage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Historiographies in Taiwan /132

XII . The Various Names , the Same Mean : Different Answers to the Common Questions /146

Postscript /158

目 录

序 言 / 001

一、那多义和尘封的历史

——历史须反复而持续地研究 / 001

二、从绝对理性的肆虐中走出

——基于自身特性的史学界定 / 012

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

——章实斋《校讎通义》的立意 / 025

四、质疑常识、常理和权威

——历史学的怀疑精神 / 037

五、词不达意和意犹未尽

——史料翻译的困境 / 049

六、那些非逻辑与反社会的史识

——历史认知中的思维缺陷 / 065

七、英雄亦有末路时

——历史主义的价值与局限 / 078

八、一种社会分层观念

——历史学中的阶级分析法 / 089

九、神与人、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

——关于西方史学阶段划分的再思考 / 102

十、在那风暴中摇曳出的风采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史学” / 119

十一、本土的与舶来的

——台湾地区史学的分期和发展 / 132

十二、其名万殊,其义一揆

——学术上的母题与子答 / 146

跋 语 / 158

一、那多义和尘封的历史

——历史须反复而持续地研究

主讲人:李勇教授

参与讨论者: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硕士研究生王露阳、李森、高壮

李勇教授:今天把大家找来讨论一种史学现象,例如,秦始皇的事迹,西汉人要研究,东汉人也要研究,直到今天仍然还要研究;再如,朱熹的学术思想,他活着的时候南宋人就研究过,后来元朝人、明朝人直到今天人们都还在研究它。这种学术现象非常普遍,外国史领域也是如此。现在要问的是,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和一直研究某一历史



人物、历史事件等历史现象呢?特别是为什么人们的认识迥异,为什么有的历史事实要被人为地尘封呢?现在,大家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理解,来一起讨论。

高壮:这的确是个普遍而有趣的现象。我想人们之所以反复和持续研究历史,那是因为有人类就有人类历史,就有历史学;前人、今人和后人,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前人研究的历史,是今人研究的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人研

究的历史的一部分,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都是后人研究的对象。

我读了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是陈恒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的本子。书中有几段话,值得注意。他说:

“历史学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不仅是其所属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言人。我们有时把历史进程喻为‘在游行的队伍’。历史学家仅仅是在队伍的其他部分蹒跚行走的另一位不起眼的人物而已……当队伍蜿蜒前进时,时而向右转,时而向左转,有时又快速后退,队伍各个部分的相对位置在不断发生变化……伴随这支队伍以及这支队伍中的历史学家前进时,不断地出现新景物、新视野。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学家在队伍中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看待过去所采取的视角。”

“历史学家在开始撰写历史之前就是历史的产物。”

“同一位历史学家不能够写出两本完全一样的历史著作。”

李森: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果真如此,李老师就不会组织咱们讨论了。

李勇教授:关于人类为什么反复和持续研究历史,高壮的分析非常有道理,他引卡尔的论述,实际是要表明历史写作的历史性。卡尔在这里还只是强调:同一个历史学家在不同时期对历史的看法会有变化。无论如何,这多少有点宿命的感觉。

不过,正像李森所说的那样,问题没那么简单,此次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仅仅指出历史认识在不断变化而已。我主要从历史意义的赋予和表微、历史事实的掩盖和钩沉这一角度,提起大家研讨。

历史现象在不同人那里,具有不同含义,也就有诸多意义;而意义与认识者的价值观念、愿望相联系,或者说现实中历史认识者的价值观、愿望决定他对历史现象意义的理解或阐释;现实中历史认识者,可能会放大历史现象所能包含的意义,同时会掩盖有可能包含其所反对的意义的那些历史现象。你们可以谈谈以往学者关于历史意义的相关论述吗?

王露阳:我读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社会科学方法论》(*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它由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出版。

韦伯认为,价值尺度能够和必定引起冲突,这不仅与世界观相互联系,而

且与“阶级利益”休息相关；一切对于他人意欲的有意义评价，都只能出于自己的“世界观”的批判，以自己的理想为依据与他人理想所作的斗争；人们的兴趣受价值观念制约，只能使每次观察到的个别事实很小一部分具有色彩，唯有这一部分才对人们有意义，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表明了那些因与价值观念的联结而对人们变得重要的关联；对家谱这样小的历史和最大文化现象之间，人们的兴趣存在着无限意义的阶梯，因此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种研究深入因果联系在无限性中能有多远，都取决于支配着研究和他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韦伯提出了价值观念、现实利益决定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和价值判断。

李森：我读了英国学者帕特里克·加登纳（Patrick Gardiner）著的《历史解释的性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此书由江怡译成汉文，文津出版社2005年出版。

加登纳举例说明因果“解释”（Explanation）的复杂和模糊性，这个例子是“我们可以把某人头疼解释为他在太阳底下坐了很长时间，或他一直很卖力地工作，但我们也可以把这解释为，这是快要得流感的征兆。”

他还看到历史叙述的语言问题。加登纳说历史学家面对一大堆问题会闪烁其词，历史著作中缺乏的，是体现经验选择特征之间精确关联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陈述系统。他认为，人们使用的这种语言与其目的和兴趣有关，与其所做的事情有关，与其发现自己在任何时候所处的境地有关，因此决定用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描述历史完全取决于人们的目的。

他还提出，历史学谈论的是人类的行为，人们通常通过类比自己的经验而理解他人的行为。

加登纳的论述，表明语言、目的和经验，都可以导致对于历史的不同解释。我想这也会引起人们体会到不同的历史意义。

我还看了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La Storia Come Pensiero E Come Azione*），这本书是田时刚译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克罗齐说：“判断一部历史著作只应根据其历史性，正如判断一部诗歌作品只应根据其诗性一样。历史性可界定为由实际生活需求激起的理解和领悟行为；若这种需求反对的幻觉、疑惑和晦涩，未能依靠理论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即被思维活动驱散,它就不能转化为行动而得以满足。实际生活需求的多样性赋予历史性必要的前提:它是道德需求,即认识人们处于什么条件,才能产生善的启示、善行和向善的生活;或是纯粹经济需求,以认真考察自己的利益;或是审美需求,正如澄清一个词、一个隐语、一种精神状态的意义,以便使之同一首诗紧密相连并鉴赏此诗;或许是智力需求,正如首先纠正、接着在补充缺乏术语的信息(这是犹豫和疑惑的原因所在),以解决科学问题。”

他还说:“一切民族的、所有时代的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产生的,总在出现的新需求和相关的新晦涩的推动下产生。”

李勇教授:很好。现在,把你们提到的几个思想家的观点归纳一下:学者们承认历史认识具有历史性,提出价值观念、现实利益决定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和价值判断;特别是现实需求包括道德需求、经济需求、审美需求和智力需求,决定历史认识的差异;另外,历史认识跟解释者的语言和经验脱不了干系。

当然,学术史上也有学者不赞成这些观点,把它们视之为历史相对主义。可是,这些不赞成者的观点意味着什么呢?

我来补充一个反面材料。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历史与记忆》(*Histoire et Mémoire*),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本子。

勒高夫在书中倒是反历史相对主义,为历史学客观性而辩护。他有一段话很典型:“通过对历史研究进行不断地修正,通过艰苦且卓有成效地校正,通过真相的点滴积累,历史客观性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最终慢慢地被确立起来了。”

既然他说“修正”“校正”“积累”,那就说明他承认历史学曾经有错误和不足,那就说明他看到历史认识的不客观,这恰好从反面说明反复和持续研究历史的必要性。

再如,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历史学十二讲》(*Douze Lecons sur L' Histoire*),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汉译本。

普罗斯特在这本著作中,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说:“历史学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然后才是一种科学实践,说得更准确些,历史学在科学上的鹤的同时也是其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有所秉持与获得意义的手段。”

他认为,要开展历史研究,首先要提出问题,“问题的更新是历史学科演变的动力,而这显然不是出于历史学家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此外有两个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问题。一方面,集体好奇心在转移;另一方面,在发展变化的理论内部,证实或者否定某些假设又引发了新的假设。因此,调查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展开,没有止境。和事实一样,历史学问题也是无法穷尽的:总是得重写历史。然而,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有一些历史学问题不再被人提及,而另一些则被提出。前者人们曾一再讨论,已经是老生常谈,而后者正是历史学家这份职业关注的焦点。”

显然,安托万·普罗斯特没有采取社会性对历史学的历史性影响的视角,而是从史学家集体好奇心和研究中的新假设的角度谈问题。无论如何,他毕竟承认历史知识的变化,为人们反复和持续研究历史提供不同的理论依据。

到现在,咱们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大家能否举例说明历史的多重意义呢?

李森:您的《保卫历史学》,有一章名为《实用中史学主体的两难:历史学实用化悖论》,其中所举吴晗的例子,其实就是历史意义多样的典型。我记得,书中所述大概是这样的:

吴晗对毛泽东无限忠诚,非常自觉地以其言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连重写朱元璋传和研究海瑞也是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先说说吴晗改写朱元璋传。吴晗在1950年《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一文和在第四版《朱元璋传》中说得相当清楚。吴晗在前三个版本的朱元璋传中,一是对西系红巾军组织者彭莹玉,轻率地根据不充分的史料,以为他功成身退,赞叹不已。毛泽东指出这一认识有问题,吴晗后来查了史料,发现彭莹玉被元军捉住杀害;二是对朱元璋进行过分指责,作出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评价,也需要重写,于是吴晗再次改写朱元璋的传记。

还有,吴晗研究海瑞有类似之处。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交代得很明白。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一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更使一些干部不讲真话,对许多问题报喜不报忧。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开会,毛泽东批评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作风,在看了湘剧《生死牌》中的海瑞后,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求先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吴晗这才写了《海瑞骂皇帝》《海瑞》《清官海瑞》《海

瑞的故事》和《论海瑞》等文章。

问题是历史人物在现实中的意义是多样的,换句话说,同一个历史人物在现实社会的不同场景里,会凸显出不同的意义。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专制集权措施,压制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蒋介石恰恰就是这样的。为了揭露蒋介石,抨击朱元璋的独裁就变得非常有意义了,不难理解,吴晗在民国时期大骂朱元璋,“桀骜不驯的元功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甚至都不敢出一口大气了。”可是,朱元璋毕竟是反抗元朝统治的农民革命领袖,如果按照以古讽今的思路,那么朱元璋势必同现实中的革命领袖发生关联,过分地批评朱元璋在这层意义上就变成错误的了,所以吴晗“便决意重写,改造错误”,对朱元璋大力歌颂,说:“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进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绝的人物。”

在海瑞的评价问题上,也存在着类似情况。海瑞是个敢讲真话、为民请命,又被皇帝罢了官的清官。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感兴趣的是他的敢讲真话,虽然骂皇帝,但又忠于皇帝。吴晗的《论海瑞》是庐山会议之前写的,而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的,系统地研究了海瑞一生的功绩,他在《论海瑞》中认为“海瑞在历史上是有地位的。这样的人物,从今天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该不该肯定,该不该歌颂?答案是应该肯定,应该歌颂。”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就说:“这篇《论海瑞》同样也是古为今用的,是针对当时干部中存在着不敢说真话的问题而写的,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写的,用意是清楚的。”可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海瑞的现实意义产生了新的一层,那就是他与彭德怀发生了关联,嘉靖皇帝同毛泽东发生了关联,尽管吴晗本人没那个意思,然而其他人会认为吴晗有这个意思。所以才会有人暗示吴晗说海瑞不是现实中的“右派”分子,这就是人们在《论海瑞》中看到的那段话,“今天有些人自命为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显而易见,吴晗接受了他

人的告诫,表明自己所写的历史上的海瑞跟现实中的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吴晗想脱干系,但是没有做到,后来姚文元就说,有人要替“右派”分子平反,反对“人民公社”,主张退田让农民单干,吴晗写海瑞“平冤狱”和“退田”事迹,就是为这一行为呐喊的。就连毛泽东本人也产生类似想法,认为吴晗写海瑞,关键是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而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

可见,同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不同场合,都同现实发生着不同关联,具有不同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史学家甚至是同一个史学家,对他曾提出见解的历史现象重新认识。

李勇教授:是的。李森的复述大体与我在《保卫历史学》中的相关论述吻合。

历史上的朱元璋和海瑞,他们自身蕴含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可是自己不能言表,靠后人发现和阐释。吴晗先是看到在蒋介石统治下揭示其专制、残暴对于现实的意义,可是在毛泽东那里,朱元璋又有农民革命领袖的意义。同一个历史人物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场合其意义都不一样。吴晗所研究的海瑞有忠诚、清正的现实意义,可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则呈现出反对“人民公社化”和为“右派”叫屈的现实意义。仍然是同一个历史人物在同一个时代不同场合其意义发生变化。既如此,遑论同一历史现象在不同长时段里的意义呢?

由于人们利益差异、道德尺度变化,其必然要求历史研究表现出旨趣上的变化,甚至有的还要有意地掩盖。你们看英文 *recover* 就很有意思,它由 *re* 和 *cover* 组成,有“重新获得”之义,还有“重新盖上”之义。说起来,这个词表达出人们的率性,它要表达的是当人们获取一种东西的时候,其实也就掩饰了另外一种东西。哈哈,这是一朵花絮,有望文生义之嫌。

现在,咱们看看有没有历史现象被掩盖的例子。

高壮:有的。李老师多次说过,学术史上,不少人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但是,他在某一领域的影响被过度放大,以至于人们认为他在其他领域没有成就。

李老师就曾经研究过被史学界忽视的杨万里。宋代杨万里,做文学家都知道其“诚斋体”诗歌。可是,他还有《诚斋易传》,以史事参证《易》理,又以《易》理中的通变思想去诠释历史。这样看来,他还是位经学家和历史学家。

其实,杨万里在《易》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一·易类一》说:“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全祖望在《跋〈诚斋易传〉》中说:杨万里“以史事证经学,学尤为洞邃。予尝谓明辅嗣之传,当以伊川为正脉,诚斋为小宗。胡安定、苏眉山诸家不如也。”当代学者中,杜国庠重视杨万里,侯外庐在《杜国庠文集序》中,承认他写杨万里是受杜国庠影响,“他还对我嘱咐,如果再版《中国思想通史》时,切记补充写上宋代的杨万里……他说南宋时代的杨万里在唯物主义阵营中是陈亮、叶适以外的一支别出学派。这一点,他在《便桥集》中已经又简略地论述。我在新近编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依据杜国庠同志的遗言,特写了一节《杨万里思想》。”这说明,杨万里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也被认可了。

但是,他的史学地位呢?杨万里的《易》学是六宗之一,其以史证《易》,以《易》解史,非常重要,学术史特别是史学史应该加以深入而具体研究。然而,总体说来,在后人的史学史写作中,杨万里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老师您正抓住这一点,写出几篇文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么第一篇《杨万里史学思想钩沉》,发表在《学术月刊》1998年第6期;第二篇《杨万里的历史通变思想》,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三篇《杨万里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发表在《淮北煤师院学报》1998年第3期。

李勇教授:高壮说的是事实。那跟吴怀祺先生的鼓励和引导有关。西方也应该有例子的,王露阳你说说看。

王露阳:休谟(David Hume)的史学成就被忽视,就是典型。休谟,启蒙时期英国大学者,二十三岁作《人性论》,通常作为哲学家而闻名于世,至今在人们心目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邓晓芒在为黄振定《通往人学途中:休谟人性论研究》所写《序言》中说:“在近代哲学家中,至今还被人们谈论不休的,除了康德之外,就要数休谟了。而在英语世界里,对休谟的研究和推崇还要超过康德,成为二十世纪的一大‘显学’。”

其实,他还是一位曾经颇有影响的史学家。其历史著作,有《英国史》,1762年六卷修订本出版。全称《自凯撒入侵至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简称《英国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在他生前,此书就被奉为经典著作,有7个版本在流传。在他去世后到20世纪早期,该书又出了175个版本。伏尔泰认为:它“恐怕是所有语言写成的著作中最好的。”其后学麦考莱称休谟为“最有能力和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法王路易十六把自己当成休谟《英国史》的亲密学生,其贴身侍卫记载这位国王在他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曾要求阅读有关审判和处死查理一世的部分。而托马斯·杰佛逊则从中看到托利党主义可能对美国宪政自由所带来的威胁,而在美国禁绝此书。温斯顿·邱吉尔学习英国历史,所使用的读本,是根据休谟《英国史》改成的。

正是休谟建立了苏格兰历史学派,成为罗伯逊等人的偶像。休谟指导、鼓励和赞赏爱德华·吉本的历史写作。不过,由于其哲学名重,其史学家的印象却隐退到人们记忆的后台了。我的理解是,正是这些因素,段艳学姐才选做休谟的史学,完成学位论文,并从此走上研究西方史学的道路。

李勇教授:嗯,你们说得很对。近代以前中国学者包括西方学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并没有把自己的学问限制得像今天这样壁垒森严,或是史学、文学、哲学(经学)等,而是一种开放式和复合型的。但是,因各种机遇,他学问中的某一种,被持续发现是有意义的。久而久之,他学问的其他方面则被淡化和掩饰了。这两个例子,都是研究对象上的某一点被其他点放出的光彩掩盖了,不是研究者故意而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后人故意掩盖某些历史现象。也就是说,历史上有不少人,因其言行不合时宜,而被学术界故意掩盖了,这就给后人做学术研究留下机会。这方面也能举例子不?

高壮:我来举一个吧。我看您的《保卫历史学》,其中谈到钱谦益就是被学界淡化的人物。

钱谦益是东林巨子、文坛领袖,学生中有瞿式耜等,著有《初学集》《有学集》《平蜀记事》《投笔集》《牧斋尺牍》《国初群雄事略》和《太祖实录辨证》等。阎若璩《潜丘札记》卷四《南雷黄氏哀词》称,宋明以来“博而能精,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的学者只有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三人。然而,由于他晚年降清,不为人所齿,原明朝宦党攻击之,明朝遗老遗少责骂之,清皇又指斥其有辱名教,因此《明史》不收他,乾隆《清史列传》将其收入《贰臣传》乙编中,地位竟在洪承畴等人之下,只是到了民国初修《清史稿》,才把他收入《文苑传》且

极为简略。反东林的阮大铖，献给魏忠贤的《点将录》和崔呈秀《天鉴录》中均列了钱谦益，然而黄宗羲《明儒学案》设《东林学案》，不收钱氏，清人陈鼎《东林列传》也不写钱氏。可见，人们在利用修史权淡化钱谦益的积极影响。后来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提他，甚至到了研究明史的吴晗还在其《读史札记》中骂他“对明朝失节，出卖祖国，出卖人民”，“活着含羞，死后受辱，这是投机分子应有的结局。”倒是钱穆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梨洲文史之业，接踵牧斋，步趋未变”，“清初经史之学，牧斋不能绝无影响”。

总之，钱谦益作为明末学界领袖，投降满人，背叛民族气节，为人所不齿，其学术成就许多时候在后人的学术史写作中遭到淡化，其实也就是一种掩盖。

李勇教授：由于历史上的东西，经现实观念的撞击，其过去未被发现的意义得以呈现，一旦它与时代精神或者主流观念相吻合，则会受到热捧，可是万一与时代精神或主流观念不符特别是相背离，则将遭到冷遇乃至掩盖。

中国和西方的一些学术观念有相通性，不知你们注意到这种学术现象没有？例如，西方学者提出历史的“解释”或“阐释”或“诠释”（explain / interpret），我国古人则有“发覆”“表微”，其实都是在挖掘历史的新意义或者蕴藏文献中的未被认识到的观念。又如，西方学者提出要“重构”（reconstruction / reinvent），我国学术界有“考异”“新论”之说，其实都是要给认识对象补充新的事实、赋予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逻辑结构。还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倡“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主张学术研究要关注历史上的知识碎片、断裂等一些不连续现象，而我国古人一直则有“钩沉”“抉隐”之说，其实都是要学者关注由于种种因素而被尘封的历史现象。当然，福柯的目的并不是说人们只要关注碎片和断裂，这是他在一些场合明确表示过的，不过他提醒学界关注碎片和断裂确有见地。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被掩盖的历史是人们所未言，特别是不愿言的。

从学术创新角度说，这些人们所未言的，特别是不愿言的，恰恰是好的研究选题。记得仓修良先生，2006年4月11日在咱们学校讲学，那时的学校还叫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他给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谈“读书与治学”，仓先生曾说：选择自己研究方向的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他所说的“人取”“人弃”，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热捧”和“冷遇”。相反，在认识到这一情况